

照耀整个中国革命航程的灯塔

——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 磊

毛泽东关于我国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思想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还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号召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①两位导师把这两个革命之间的关系概括为:“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③由于欧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再没有出现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列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需要也不应该再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由前者直接过渡到后者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已是腐朽的力量;要把直接转变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根本的条件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要把农民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有力量实行转变。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完成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和中國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转变理论。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航程。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光辉部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④党的历史发展就是如此:当着我们党正确地处理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时,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反之,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复杂的课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关头。如何认识国内的政治形势,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的性质是什么?从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是摆在我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南京政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既然我们进行的革命是反对南京政府,而这个

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革命的性质当然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历史证明，当时许多人包括党中央某些领导人的上述认识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对当时阶级关系作出科学分析后明确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⑤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未掌握南京政府，还要受它的打击、限制和迫害，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则是：“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⑥令人痛心的是，毛泽东的真知灼见，未被全党所接受，以致多次发生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南京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得了胜利”。^⑦由此提出：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斗争，等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充分发展了，再去举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二次革命论”实质上就是取消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基本原因是没有弄清楚中国的国情，从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超越革命阶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第一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提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⑧结果采取一系列盲动主义的政策，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认为国内的阶级关系是：“两个阶级的对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和农民”。^⑨由于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所以就提出：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冒险主义政策，使开始勃兴的革命力量又遭到重大的损失。尤其严重的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把反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强调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⑩这就严重地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结果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机会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才挽救了中国革命，把党的路线纳入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

遵义会议只能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还来不及解决中国革命性质及前途等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同年底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⑪自此以后，他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革命转变问题。这一时期的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成熟。这时，毛泽东就已科学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

(1) 深刻地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⑫他还十分生动形象地把两者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了，下篇才能做好。……

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③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只做上篇，不做下篇，自己也不亲自动手做上篇，让资产阶级去做，结果是既做不好上篇又不可能做好下篇。而‘左’倾的错误却是：上篇没有做好，就急于做下篇，或者是两篇一齐做，结果是都做不好。他们都不能正确处理“两篇文章”之间的关系，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毛泽东的不朽贡献之一就是他能“妙手著文章”。先是集中力量把上篇做好，同时在做上篇时，就为下篇作了伏笔，一旦上篇做好了，不失时机地将主要精力转入做下篇。他把辩证法运用于处理两个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正是由于他领导全党正确处理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关系，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2)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决不允许在中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毛泽东十分坚定地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④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他概括为“三个不容许”。第一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⑤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第二是社会主义不容许。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若没有国际无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援助，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更为重要。但它们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也不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早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就指出：“在中国不可能有基马尔式革命。”^⑥即没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第三是中国人民不容许。近百年的历史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决不允许民主革命胜利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⑦这就为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3) 批判“一次革命论”，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强调稳步地、从容不迫地实现革命的转变。有几种“一次革命论”搞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彻底批判，就不能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把中国革命引上正确的航道。一种是国民党顽固派的恶意宣传。他们胡说什么：一切革命都已经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只要搞一次三民主义革命，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必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共产主义也失去了在中国存在的理由，等等。顽固派鼓吹这种谬论的目的，“是想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⑧第二种“一次革命论”者与上述顽固派不同，他们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他们也模糊地认识到在中国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但认为放在民主革命里一起去完成就行了。这种思想混淆了革命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对中国人民革命是很有害的。第三种就是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次革命论”。为了彻底剥夺顽固派的精神武装，肃清“一次革命论”的恶劣影响，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毛泽东要求全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到以下几个坚持：

第一，坚持经过长期民主革命的准备，在充分具备条件后，才实行革命的转变。不到具

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需要具备那些条件才能转变呢？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在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即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使党从狭小的圈子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扩大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步一步地取得全国政权。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最后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实行转变的物质基础。只有党和无产阶级在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领导权也占绝对优势时，才算真正具备了转变的条件。要创造这些条件，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长期曲折的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这就要求革命者要有顽强性。

第二，坚持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要避免混淆两个不同革命之间的界限，必须有政策作保证。毛泽东不仅为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还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路线和政策。在政治纲领方面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方面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也要在经济上保护他们，把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保护严格区别开来。只有坚决执行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政策，才能保证不犯“左”的超越革命阶段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⑩这就要求革命者有很强的政策观念，要深刻懂得“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

第三，坚持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和实行民主主义性质的政策严格区别开来。不仅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马列主义指导才能胜利，就是第一阶段的民主革命，没有马列主义作指导，也是不能胜利的。所以，扩大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就是头等大事。也必须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保持共产党员的思想纯洁性。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执行民主主义的政策。必须把这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⑪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处理好两个不同性质革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为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转变理论奠定了基石。

二

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到来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所谓“有步骤”，是指这个转变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一九四九年秋到一九五二年底的三年时间内，革命就只是部分的转变，还不是全面的转变。换句话说，

这三年，还是处于两个革命阶段的交叉时期。正如列宁说的：“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②建国头三年就是两种革命互相交错的时期。因而革命性质的转变，社会性质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政权性质的转变，都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正是在这个历史转变的复杂环境中，又一次表现出毛泽东伟大的马列主义战略家和策略家的创造才能。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四面出击》等著作，科学地解决了革命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把民主革命全面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保证党领导全国人民从容不迫地有条不紊地实现了革命的转变，并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革命转变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几个方面：

(1) 提出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里来。由于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所以我党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是完全正确的。首先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夺取了城市，夺取了全国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也应该转移，即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农村。党的领导机关和大批干部转移到城市，建立各级政权机关和各种组织，为实行革命的转变作了工作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转入城市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学会与不拿枪的敌人作各种斗争并取得胜利。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失败，就不可能实现革命的转变。转入城市后，必须兼顾农村，加强工农联盟，以便在无产阶级周围配备好力量，保证实现全面的革命转变。

(2) 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说明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这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贡献。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清醒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状况，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科学地预见到：“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里强调的是：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只有在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事实是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三亿农业人口的地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有待实行土地改革，即封建剥削制度在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消灭，几十万国民党特务和残余反革命分子以及数十万政治土匪还在到处捣乱。所以这几年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要实现全面的革命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了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正确主张。他指出：“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③根据当时革命的对象主要还是三大敌人的客观实际，他向全会提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④总之，不要四面出击，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为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在这个路线指引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伟大的群众运动，胜利地完成了繁重的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为革命的全面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经济状况时指出：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却占百分

之九十左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此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首先，现代工业虽然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十分之一，但由于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我们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领导成分，决不要忽视或轻视这一点，否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我们先后没收了官僚资本的企业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这样，中国现代工业的绝大多数已为无产阶级所掌握，就为革命的全面转变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对于占现代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所谓利用，就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所谓限制，就是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任其泛滥，要从活动范围、税收、价格等各方面加以限制。由于资本家尤其是大资本家必然要反抗，因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事实正是这样：一九五〇年调整了工商业，私人资本又得到了发展，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施放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无产阶级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加强了工人阶级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地位，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最后，对于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既要积极又要谨慎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②4}为此，还在一九五一年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号召。在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到一九五二年秋，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初级农业合作社有三千六百多个，为大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准备了工作基础。综合上述三点可知：用政权的强制力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对私人资本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通过合作经济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它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4）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人民政权的建立，为革命的全面转变作了最为重要的政治上的准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保证革命转变的关键。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要实行革命的转变，那只是空想。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再次批判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5}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谈到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时就强调工人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就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要坚持领导权的思想。把革命领导权发展成为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根本政治保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强调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6}工农联盟是实现革命转变的力量所在，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就没有革命的转变。文章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时，要求这个政权保证：“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7}为了肩负起这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在人民内部实行

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对农民进行耐心的社会主义教育，等等。这些任务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任务，所以“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②④}但因为中国的特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这个政权，虽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毕竟还是参加了，所以不称无产阶级专政而称人民民主专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也是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②⑤}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政权，光荣地担负起革命转变的艰巨任务。

以上四方面，充分表明毛泽东无论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都为革命的全面转变，作了最充分的准备，保证我们党成功地实现了革命的全面转变。

三

经过三年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二年底，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极其繁重的任务已经完成，工农业生产已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全面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⑥}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它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②⑦}在实现这个历史性的伟大任务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 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放在首位，以创立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化的大生产则是由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准备好的。无产阶级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剥夺者，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只是一般的历史常规。但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国民党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烂摊子，如果待到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道路不仅是长期痛苦的道路，而且也是走不通的。但是，当时却有人主张，不要急于实行革命的转变，认为实行革命的转变，就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严肃批评了他们不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的错误。^{②⑧}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创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把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在把总路线的内容生动地比喻为一个鸟的主体和两翼时，就把工业化放在主体的地位，把“三大改造”放在两翼的地位。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革命转变论的又一重大发展。在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自觉地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就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并没有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而是对这一规律的自觉运用，是这一规律的不同表现形式。

(2) 强调稳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其内容就是两条：“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②⑨}“逐步”就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在一个早晨就把私有制消灭掉，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总路线规定的任务。“各种”就是指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对个体农业，我们党遵循自愿互利、典

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各种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经过几年的逐步过渡，在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相反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又一伟大贡献。

(3) 创造了用和平手段把中国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方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运用政权的力量，采取赎买的政策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设想过的，他们认为这“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设想并未实现。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虽然也采取过这种办法，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等原因，收效也甚微。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的这个思想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取得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能在中国实现马列的设想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⑤但还需要探讨具体的原因。邓小平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⑥这段话指出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毛泽东为党制定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政策；另一个原因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两个原因中，缺少任何一个原因，都不可能取得和平改造的胜利。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把这两个因素充分地发挥出来，成功地实现了和平改造的任务。在发生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历史使命。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结束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牢固地确立了。

总括全文可知：科学地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为革命的全面转变所作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革命转变的理论。它象屹立在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照亮了中国整个革命的航程，中国革命的大船才得以绕过一个一个的暗礁，胜利地到达了彼岸，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阶级对抗基本上结束了，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两个革命的伟大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革命转变论的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纪念他九十诞辰时，重新学习与研究这个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转入和平发展时期，依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③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④⑫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⑤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

⑥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

⑦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

⑧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

(下转第18页)

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中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把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根本经验写进了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全国人民非常拥护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固定了下来，为今后坚持四项基本原理提供了最权威的根据。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领导权，必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注 释：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18、169 页。
- ②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
- ③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 年 1 月。
- ④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纪录》。1927 年 8 月 7 日。
- ⑤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 3 月。
- ⑥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
- ⑦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
- ⑧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 12 月。
- ⑨⑩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
- ⑪⑫⑬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20、179、216 页。
- ⑭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5 日。
- ⑮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 年 1 月。
- ⑯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 20 日。
- ⑰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
- ⑱⑲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 ⑳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 年 11 月 12 日。
- ㉑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 年 5 月 4 日。
- 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
- ㉓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
- ㉔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 10 月 4 日。
- ㉕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3 月 11 日。
- ㉖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 1 月 18 日。
- ㉗㉘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1948 年 4 月 1 日。
- ㉙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

（上接第26页）

- ⑨ 李立三：《在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30年 3 月。
- ⑩ 王 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 2 月。
- ⑪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
- ⑬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 5 月。
- ⑭⑮⑯⑰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1 月。
- ⑱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 5 月13日。
- ⑲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 2 月。
- ㉑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
- ㉒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 ㉓㉔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 6 月。
- 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 3 月。
- ㉖㉗㉘㉙㉚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6 月。
- ㉛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 9 月。
- 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6 月27日。
- ㉝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 8 月。
- ㉞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 6 月15日。
- ㉟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 6 月14日。
- ㊱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 ㊲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